

也谈应监鬲

王龙正¹ 孙清远²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4;

2.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intendant Ying state was intendant the adherents of Shang dynasty, neither intendant Wugeng (武庚), nor intendant the king of Ying state. After Zhou tribe repressing the rebellions of Wugeng (武庚), Guan (管), Cai (蔡), the Ying state the son of King Wu of Zhou princedoms located the Shanxi churchyard was given a new mission to supervise the adherents of Shang dynasty by Duke Zhou and King Cheng because it neighbored Anyang (安阳) the former capital of Yin. Intendant Ying state maybe a appellation of the king of Ying state when he accepted the mission of intendant the adherents of Shang dynasty after the rebellions of Guan (管) and Cai (蔡). The Ying state lied in the south of Zhou dynasty after migrating southward, the king was still called marquis of Ying state. The king was also called duke of Ying state because he was a high official of Zhou royal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Ying state; intendant Ying state; Ying Shu; marquis of Ying state; duke of Ying state

摘要: 应监是监督殷遗民而非监督武庚, 更非监督应国国君。在周王朝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 位于山西境内“武之穆(周武王之子)”的封国——应国, 因其地邻近殷朝旧都安阳, 而被周公与成王赋予监督殷遗民的新使命, “应监”可能是管蔡之乱后, 应国国君应叔兼领监督殷遗民任务之时的称谓, 南迁后的应国地处周王朝南疆, 其国君仍然称为应侯, 之所以称为应公者, 则是因为他曾兼任周王室的卿士。

关键词: 应国; 应监; 应叔; 应侯; 应公

关于传世应国铜器铭文中应叔、应监、应公等三种称谓的关系纠葛, 以前很少有学者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 但对应国历史的研究而言, 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拟在对应国墓地发掘资料进行较深入探讨的基础上, 对前贤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 并试图为这一问题找到一个较好的答案, 以供读者参考。

一、应监鬲与周公东征后的监殷机制

应监鬲出土于江西余干县的一所中学内, 没有伴出其他器物, 所以朱心持先生推测应为某人的“家藏”之物^[1], 这显然是正确的。这就跟应侯见工钟发现于陕西蓝田一样, 大概都是首先从应国墓地流传出去, 然后经过某些人的收藏, 最后由于某种原因才临时埋藏于地下的。郭沫若先生认为, 应监是周王朝“派往应国的监国使臣”, 与西周初年的监国制度密切相关^[2]。何

浩、耿铁华先生赞同郭老的意见, 认为应监被派往应国, 其主要职能是更直接地监督控制应侯或应公, 以维护西周王朝的利益^[3]。李学勤先生虽然也持同样的观点, 但由于联系到江西靖安铜器窖藏坑所出春秋晚期应君之孙铜炉盘, 转而另创新说, 并提出三点意见: 其一, “鬲铭应监未必是姬姓应国的监”, 而可能是周公东征之后周王朝在江西北部设置的监国者; 其二, 至于春秋晚期的应君, 则可能是楚国或吴国的封君, 或为土著首领也未可知, “应的位置很可能就在鄱阳湖附近”; 其三, 在江西出土的此二件铜器反映了当地一段曾经的历史, 与西周时期的应国没有关系^[4]。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徐中舒、何光岳先生的观点, 例如徐先生认为应监“是武王之子, 开始是派出来作监的, 他也领有采邑, 后来才逐渐发展为诸侯”^[5]; 何光岳先生根据丁山先生关

于商代应国在山西的考证,认为西周时期的古应国最初依然在山西境内,处于殷代王畿西边,并且指出应监和周初管、蔡、霍“三监”一样,也是为监督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而设,这可能是应国国君应侯的另一兼职^[6]。

要想解决“应监”究竟是监督应侯还是监督殷民,必须弄清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其中作为傅相的管、蔡二监,其常居之所在是否在武庚所封的殷国内,是否在名义上是武庚的副职,其实质则是周王室所派的监督员,犹如善鼎铭文的“佐胥侯,监豳师戎”呢?其次,是否像管、蔡等国一样,某监的居所在所监之国的外围,其地位是否与普通诸侯相当呢?其三,当时“三监”的任务究竟是监督殷王子武庚禄父,还是监督殷民,管叔、蔡叔在自称其官职时究竟是管监、蔡监,还是统称为殷监呢?

据文献记载,周初的“三监”是在殷商旧都安阳及其周围,譬如《逸周书·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又,《逸周书·作洛篇》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顾颉刚、刘起舒、杜勇先生均认为,霍叔不在“三监”之列,“三监”是指武庚禄父、管叔、蔡叔等人,“俾监殷臣”是监督殷民,而非武庚^[7]。杜勇先生还坚决反对后世将三监的封地与邶、鄘、卫联系起来的说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其称谓可以看出,管叔、蔡叔当位列诸侯,分别领有管国、蔡国,犹如唐叔封于唐国(后称为晋国),应叔封于应国一样。至于“三监”被赋予的主要任务,大概是指他们各自带领军队在军事行动中相互协调与合作,以共同对殷民实施管制,从而预防其反叛,当然不排除武王指望管、蔡二叔在军事行动上能对武庚起到牵制与监督作用。可以看出,监的这种特点似乎带有临时需要而即设的性质,很难说它就是一种常设的行政机构,所以正像杜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周初存在监国制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8]。

古代文献中“监”字的用法大致有以下几种:首先,《尚书·高宗彤日》:“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尚书·太甲》:“天监厥德,用集大命。”又,《诗·大雅·大明》:“天监在下,有

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此三处的“天监”显然是指上天对人间或对某人德行的监督,而非监督上天;其次,《天亡簋》:“天亡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禀上帝。文王监在上。”显然“文王”是监的主动者,而非受动者,决非被监督的对象;其三,《尚书·多方》记载周公征奄归来告诫殷人和对周怀有二心的诸侯君臣们的话“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意思是说,直到今天,你们听命臣服于我周天子,奔走效劳已经五年^[9]。显然文中针对殷商贵族与多国(多方、有方,可理解为多邦、有邦,义指诸侯国)贵族而言的“我监”并非监我,相当于“周监”,指周天子而言,而非周初“三监。因为成王即位第一年即周革殷命的第三年,“武庚、管叔、蔡叔”等三监即已叛周^[10],故而可以排除“殷遗民臣于三监五个年头”的解释。显然,上文“监”字前面的“天”、“文王”、“我”都是主语,并非被监督的对象,所以“应监”亦非监应,而理应与“三监”一样,是监督殷民。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其称谓而言,武庚、管叔、蔡叔可能分别被称为管监、蔡监、殷监;就其职能而言,当如姚鼎、顾颉刚、刘起舒等先生根据《汉书·地理志》所主张的那样,武庚、管叔、蔡叔等“三监”的共同任务是监督殷遗民,绝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是由管、蔡、霍叔监督武庚^[11]。讨论至此即可发现,应监是监督殷遗民而非监督武庚,更非监督应国国君。

再者,周武王翦灭商纣之后,对殷商贵族施以怀柔手段,谋图团结,极尽拉拢劝说之事,譬如《尚书》中的《多方》与《多士》都是周公与成王对殷商贵族的劝说之辞;同时还分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商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安阳,使之得以继续对其祖先商汤进行祭祀。显而易见,当时周王朝立足未稳,对尚有一定势力的武庚禄父怀有戒心,深恐其聚众叛周,即便事实上委派管叔、蔡叔正是对其实施监督,但在名义上也会以团结为重,更不会如此昭告天下,何况起初武庚禄父可能并无过错,因而理应在名义上被一视同仁。如果依传统观点,认为“三监”为管叔、蔡叔、霍叔,而且当初分封时就向世人挑明是专门监督殷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的^[12],则就有故意挑起事端以与武庚为敌并专门为激起他的反叛之

心的嫌疑，那岂不是与周武王对黄帝、神农、虞、夏、商等名门之后施以绥靖政策的初衷相违背吗？

其实，对于将应监视为周王朝派遣来监视应国国君的特殊官员的观点，近年刘正先生已提出质疑，他认为那种解释违背金文中氏名与官职名相结合的一般命名原则，因而是不能成立的^[13]。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他对应监是应国派出的监督江西某位诸侯的官员的解释，则似有不妥。

在此有必要对周王朝设立“应监”的可能性进行具体分析。《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由此可知，成王与周公在成王二年平息“武庚、管、蔡之乱”，而前引《多方》所述“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的“五祀”，应当是周武王克殷之后的成王三年（注：周武王克殷后二年崩，至成王三年，正合五年之数），正当成王、周公刚刚“践奄”归来，《多方》开篇的“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成周”也说明了这一点。刘起釭先生认为，《多方》的诰辞针对的是已经定居于宗周镐京的“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与“有方多士及殷多士”^[14]。由此不难看出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当成王二年“克殷”（指平定三监之乱而言）之后，已将部分殷商贵族（殷多士）与其他诸侯方国的贵族迁到了镐京宗周，这应是针对殷民的第一次迁徙；其二，直到“四年建侯卫”期间，将原分封于禹县和临汝之间的康叔改封于殷都中心，以新建卫国^[15]，并将原封于河南鲁山一带的周公长子伯禽改封于山东曲阜，以新建鲁国，新分封唐叔虞于殷都西边的山西南部，以建立唐国；其三，在分封卫国、鲁国与唐国之时，分别顺带赐予其尚在殷都附近的殷遗民“殷民七族”、“殷民六族”与“怀姓九宗”，此外还将殷遗民中一部分迁于成周的“九毕”。这是在迁殷民于宗周之后对殷遗民（或称殷余民）的第二次迁徙^[16]。试想在“二年克殷”至“四年建侯卫”的这一段日子里，由于管、蔡等“二监”被废黜，武庚禄父北逃，对于除迁往宗周之外尚在殷商旧都安阳附近的殷遗民，周王朝难道就没有派大臣进行监督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周王朝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位于山西境内“武之

穆（周武王之子）”的封国——应国，因其地邻近殷朝旧都安阳，而被周公与成王赋予监督殷遗民的新使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认为“应监”可能是管蔡之乱后，应国国君应叔兼领监督殷遗民任务之时的称谓，直到“四年建侯卫”时改封康叔于卫国，分封微子启以殷民而建立宋国，并由卫、鲁、唐国及成周等处分散瓦解了殷遗民之后，应君的这一使命才终告结束，继而重新恢复了应侯的称谓。何光岳先生就持这种观点^[17]，只是他推测应监与“三监”同时分封，倒是没有多少证据，但他认为应国初封于山西境内，“应监”是监督殷民，则是完全正确的。

由此联系到1964年山东黄县（今为龙口市）芦头镇韩栾村出土的一件成王时期的分档铜鼎，其铭文为“应监作宝尊彝”^[18]，与应监鬲铭文格式完全相同。其中应监所在的应国应是周王朝在当地建立的一个小方国^[19]。至于应监鼎的制作年代，理应与周王朝初年设置三监乃至应监的时间大体相当，而应监可能是周王朝委派于山东半岛、承担着临时监治某国殷商民众的应国国君，其身分与应监大体相当。

至于春秋战国以来成书的《礼记·王制》所云“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则与西周早期所行用的监国制度已经相去甚远。

二、应叔方鼎与周武王庶子应叔及其不断升迁

学者研究指出，作为青铜器自名的鬲，一般情况下是西周早期直角四足铜方鼎的专名^[20]。在铭文中同样称为鬲的铜方鼎，还有晋侯墓地西周昭王时期墓葬M114所出被认为是周武王庶子唐叔虞的叔矢铜方鼎^[21]。今应叔鼎虽然未见图形，但因其铭文自名为鬲^[22]，当为方鼎无疑。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邰、晋、应、韩，武之穆也”的记载可知，应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武王庶子，当称为应叔。我们推测，应叔方鼎即铸造于应叔刚分封不久的周成王时期。显然，鼎铭“应叔”与文献记载的周文王之子管叔鲜、蔡叔度、毛叔郑等情况一样，是西周初年周王诸子分封后的习惯性称谓。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件在成王时期铸造的应叔方鼎可能与叔矢方鼎的形制与纹样大体相同或相近。

大概鉴于其兼任应监时的特殊贡献，应侯成为周王室内举足轻重的大臣，所以才赢得了

《诗经》里周成王感叹的“媚兹一人，应侯顺德”的夸奖之辞。大概随后不久，应侯更被晋升为卿士，成为周王室内的“三公”之一，称为应公。早年传世的周成王时期的十六字应公鼎甲、乙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23]。

或许在康王即位前后，由于殷遗民势力逐渐削弱，已无法形成对周王朝政权的威胁，而位于江淮流域的南淮夷与楚国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周王朝南方的劲敌。于是，周王室便开始了军事上的战略大转移，分次分批地将以前分封在黄河以北或黄河流域的姬姓或非姬姓诸侯国迁往江淮流域，以阻挡南淮夷等向北进攻，而原居于山西的应国就被迁到了今河南平顶山一带。众所周知，领有汴镐地区王畿的采邑者，其封君大多以伯、仲、叔、季等行第自称，如井伯、井叔等，分封于边远地区者主要以加强边防为职责，承担着警戒与侯望的任务，故得以称为侯，如井（邢）侯、晋侯、应侯等^[24]。南迁后的应国地处周王朝南疆，其国君仍然称为应侯，之所以称为应公者，则是因为他曾兼任周王室的卿士（详下）。总之，应国与南阳盆地的谢国、邓国、唐国，乃至湖北境内的鄂国、曾国一起^[25]，在周王朝的南方自南向北构筑起一道十分厚实坚固的屏障，在西周早期有效地阻挡了南方劲敌南淮夷与荆楚的北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历史记载的昭王南征军事行动，必然会得到位于征途中的应国的鼎力相助。

三、应公诸器与周王朝的“三公”

从《逸周书·王会解》“内台西面正北方应侯”的记载可以看出，周初应国被封为侯爵，国君被称为应侯。然而，在传世西周早期应国有铭铜礼器中，始终没有见到“应侯”字样，屡屡出现的却是“应公”的称谓，据统计有12件应公铜器^[26]。毋庸置疑，应公是应国的国君，但对于其中“公”字的解释仍有辨析的必要。一般认为，“公”字有六种含义：其一，是对德高望重且年纪较大的高级贵族的一种尊称；其二，指父亲而言；其三，是指周王室太师、太保、太傅等“三公”之一，如周初的周公、召公、太公等；其四，是指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爵级中的公爵；其五，在西周、春秋乃至战国时期，诸侯国国君死后大都追封一个谥号，谥号的后面往往会附加一个“公”字，是一种对死者的尊称；其六，有学者认为，西周

贵族称公与否，并不代表其地位与身分有多么高贵，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经学者研究发现，所谓十分严格的五等爵制是后人编纂历史之时加以完善改造的结果，在金文中其实是不存在的。

在两周金文中生时得以称公者寥寥无几，可以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周初年周武王以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为“三公”，例如《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在两周金文与文献中，穆王时期班簋的虢城公去世后由毛公接任，厉王时期的郭公长父，宣王时期毛公（见毛公鼎铭文）、虢文公（虢文公作鼎铭文），幽王时期的虢公鼓（文献亦称为虢石父）、祭公敦，平王时期的郑武公、郑庄公，平王之后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虢公丑等。不难看出，这些号称为“公”的历史名人往往都是大国或强国的国君，他们因兼任周王朝卿士而得以称为“公”，其身分与地位远在一般诸侯贵族之上，推测可能相当于后世的丞相或宰相。值得说明的是，他们在自称时往往以谦称示人，譬如虢公或称为虢仲、虢季等。这种除周天子以外至高无上的职位所带来的荣誉，正是自春秋以后引起各大国诸侯竞相称公的原因所在。就考古发现而言，文献记载一直身为周王卿士而得以称公的虢国国君，在年代为两周之际的虢国墓地中，国君乃至太子一律享用七鼎礼制。与之相比，西周时期的晋国国君因其没有兼任周王朝卿士的原因，在年代为西周时期的晋侯墓地中，国君称为晋侯而没有称为晋公，一直享用五鼎礼制。

据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少在西周时期诸侯国国君生时得以称为“某公”者，大都是因为其兼任周王的左右卿士，是当时的“三公”或“二公”之一。这些作为生称的“某公”多数不能由其子孙世袭，这可能是周王朝的一个规定。譬如，在穆王时期的班簋铭文中，逝世的虢城公的职位没有被虢公子孙继任，却由毛国国君毛公接替；周公之子君陈在西周金文中称为明公，而不称为周公，至于文献称之为周平公则只是其谥号而已，与生称周公不能同日而语。

春秋以后，诸侯、大夫依次相继僭越，楚国自称为王，姬姓大国纷纷称公，正是因为受到西周时期所谓公爵之名的诱惑。当然，某些高级贵

族死后在其谥号后面附加“公”字，如釐公、惠公、武公等，则是对死者的加封和尊称，与“三公”称谓并没有必然联系。必须指出的是，传世应国铜器铭文中的应公，是作器者之名，是其生前的称谓，与祭祀对象的“公”不可相提并论。

四、关于成王、应公的年龄

除周成王外，文献记载周武王之子中尚有四人受封疆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邶、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曰“四国皆武王子。”关于周成王即位时的年龄，学者或以为13岁，或主张23岁。当七年后周公返政成王之时，成王或到了冠礼之年的20岁，或到而立之年的30岁。《尚书·召诰》称周成王为元子，云“有王虽小，元子哉！”一般来说，元子即长子，所以很少有人怀疑周武王其他诸子的年龄都比周成王小。然而，春秋铜器晋公盂的出土却改变了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其铭文记载有晋公说的话“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佐佑武王，龠鬯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27]。铭文中的唐公无疑是周武王庶子之一的唐叔虞，他能够协助周武王到全国各地与百蛮修好，从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前来朝拜周王朝，其年龄长于被称为“元子”的成王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当武王去世之时，成王尚不能主事，而由周公代为摄政。无独有偶，《尚书·召诰》也以殷纣王为元子，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然而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帝乙之子微子启虽年长于商王受（纣），但由于“启母贱”的原因而“不得嗣”。这就是说，商纣王因为是帝乙的嫡妻所生之子，故得以称为元子并继承王位，而微子启由于是帝乙的偏妃所生，尽管其年龄比商纣王大，仍不得嗣。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作为周武王庶子的邶、晋、应、韩等国国君，有的年龄尽管较成王大，或因其生母非武王正妻，终究未能继承王位。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年代为成王时期的应公鼎甲、乙铭文明确显示，当成王时期应国国君已经得以称为应公，并且能和周公一起举行祭祀活动，还可以铸造铜鼎以祭祀武王，所以应公年长于成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推测应叔或为周王朝立有大功，才被晋升为“三公”而得以称为应公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诗

经》中“媚兹一人，应侯顺德”这句成王赞美应侯的诗句的真正含义。

- [1] 朱心持. 江西余干黄金埠出土铜鬲 [J]. 考古, 1960 (2).
- [2] 郭沫若. 释应监鬲 [J]. 考古学报, 1960 (1); 郭沫若. 中国史稿 (第一册) [M]. 人民出版社, 1977: 268.
- [3] 伍仕谦. 论西周初年的监国制度 [J]. 人文杂志 (先秦专号) 1984 (2); 何浩. 应国兴亡史略//楚灭国研究 [M]. 武汉出版社, 1989; 耿铁华. 应监鬲考释 [J]. 东北大学学报, 1987 (1); 耿铁华. 西周监国制度的几件铜器 [J]. 考古与文物, 1985 (4); 王健, 朱桢. 由康侯簋铭文说到周初三监 [J]. 殷都学刊, 1988 (3).
- [4] 李学勤. 应监鬲新说 [J]. 江西历史文物, 1987 (1).
- [5] 徐中舒. 西周史论述 (上)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 (3).
- [6] [17] 何光岳. 应国略考 [J]. 江汉考古, 1988 (2).
- [7] 顾颉刚. 三监考 [J]. 人文杂志, 1985 (6); 刘起舒. 古史续辨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14-520; 杜勇. 从三监看武王大分封的性质 [J]. 人文杂志, 1999 (1).
- [8] 杜勇. 从三监看武王大分封的性质 [J]. 人文杂志, 1999 (1).
- [9] 顾宝田. 尚书译注 [M].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197.
- [10] 刘起舒. 古史续辨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18.
- [11] 刘起舒. 古史续辨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18-520.
- [12] 陈昌远. 西周监官制度浅说 [J]. 河南大学学报, 1985 (4).
- [13] 刘正. 江西所出应国铜器铭文研究 [J]. 南方文物, 2006 (2).
- [14] 刘起舒. 古史续辨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365.
- [15] 刘起舒. 古史续辨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29.
- [16] 刘起舒. 古史续辨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34.
- [17] 李步青, 林仙庭. 山东省龙口市出土西周铜鼎 [J]. 文物, 1991 (5).
- [19]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中)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400. (下转 66 页)

- [45] [宋] 范晔. 后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759.
- [46] [周] 韩非. 韩非子 [M], //二十二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171; 陈奇猷校注. 韩非子集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4: 839.
- [47]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1—12.
- [48] 王建中, 闪修山. 南阳两汉画像石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图 36, 图 43, 图 44, 图 47, 图 75; 周到, 吕品, 汤文兴. 河南汉代画像砖 [M], 上海: 上海美术出版社, 1985: 图一四四, 图一四五, 图二二一, 图二二二, 图二二五; 黄明兰. 洛阳西汉画像空心砖 [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 26, 27; 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图二二八, 图二二九; 高文. 四川汉代画像石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7: 图 1, 图 13.
- [49]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40.
- [50]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035; 王守谦等译注. 左传全译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1140.
- [51] [秦] 吕不韦. 吕氏春秋 [M], //二十二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715; 陈奇猷. 吕氏春秋校释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4: 1532.
- [52] 国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62.
- [53] [汉]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95.
- [54] [晋] 崔豹. 古今注 [M], //百子全书,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图 11.
- [55] [56] [东汉]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04, 2887, 3055.
- [57] [晋] 司马彪. 后汉书·舆服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650~3651.
- [58] 周到、吕品、汤文兴. 河南汉代画像砖 [M], 上海: 上海美术出版社, 1985: 图一一九.
- [59] 朱锡禄. 武氏祠汉画像石 [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1986: 图五一、图五三, 123~124 页文字说明.
- [60] 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42, 图一二四.
- [61] 周到, 王晓. 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44.
- [62] 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93, 37; 王建中, 闪修山. 南阳两汉画像石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图 192、图 193.
- [63] 高书林. 淮北汉画像石 [M],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72.

(责任编辑: 武 玮)

(上接 49 页)

- [20] 杨宝成, 刘森森. 商周方鼎初论 [J]. 考古, 1991 (6).
- [21] 李伯谦. 叔矢方鼎铭文考释 [J]. 文物, 2001 (8).
- [22] [25]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
- [2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品.
- [24]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M]. 商务印书馆, 1988.
- [25] 近期湖北随州羊子山与叶家山分别发现的鄂、曾国墓地.
-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 (第一卷) [M] 之 M2001 虢季墓. 文物出版社, 1999.
- [27] 张亚初.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M]. 中华书局, 2001: 159.

(责任编辑: 曹汉刚)